

ES

从商行到学府：

1620—1862年的中国英语教育

余德英
著

From Trading Companies to Schools:
Th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1620-1862)

1620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1862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ES

From Trading Companies to Schools:
Th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1620-1862)

从商行到学府：

1620—1862年的中国英语教育

余德英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商行到学府:1620—1862年的中国英语教育 / 余德英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5444-9610-0

I. ①从… II. ①余… III. ①英语—语言教学—教育史—中
国—1620—1862 IV. ①H31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0888号



肇庆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金资助

责任编辑 董 洪

书籍设计 陆 弦

从商行到学府:1620—1862年的中国英语教育
余德英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635 1/16 印张 16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9610-0/G·7922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序

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有关它的历史的叙述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因为有没有关于它的历史叙述,差不多可以关系到这门学科能否达到“自觉”的水平。于是,我们看到了林林总总的学科史著述。然而,中国的英语教育学科,有关它的历史,长期以来人们所知道的,不能说是清楚的。尤其是它的早期发生历史,更显得扑朔迷离。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中国的普通学校开设英语课程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1904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从中学阶段起,学校开设外国语(主要是英语)课,这是法令规定并在普通中小学校开设外语(英语)课程的开始。从那时起直至现今,英语始终是在中国的学校中普遍开设的一门外语课程,它贯穿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不仅人人要学,而且课时数多,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如果要作追溯的话,中国近代学校开设英语课程还可以上溯到洋务运动时期。1862 年成立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起初就是一所外文学堂,兴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能与列强打交道的外语人才。通常,人们是以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学校外语(英语)教育之始,诸多英语教育史著作就以此为起点,并能够做到言而能详。然而,中

国和欧洲诸国的商贸、文化交流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那时的中国人是怎么学会用对方的语言进行交往的呢?易言之,中国近代前的英语教育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在很长时期里,人们难言其详。

有关英语教育发生时期的情况,历史上不能说没有记载。从17世纪到19世纪,那些来华的欧美航海家、旅行家、商人、传教士等,留下了诸多航海日记、旅游见闻、杂记笔录、往来书信、书报杂志,在记叙所见所闻的同时,也顺带记录下了当时的中国人——通事、商贩、水手、仆佣、店员、裁缝、鞋匠等学说英语的信息。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信息也多是一鳞半爪,只是些片断,无法让我们得睹当时人们学说英语和英语教育发生之全豹。近数十年来,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人们对学习英语的重视,中国的英语教育起源问题也更多地引起学者关注,出现了多部英语教育史著作,但这些著作绝大多数是从近代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的英语教育起述,即使少数论著追溯到英语教育的发生时期,但其叙述往往是“打马过桥”,其系统和完善显得相当不足。因此,中国英语教育历史之链的早期环节依旧是残缺而不完整的,这样的状况相对于英语教育这样一门学科来说,实在很不相称。余德英有志于将英语教育在中国的早期历史还原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她敢于迎难而上,而她的论著《从商行到学府:1620—1862 年的中国英语教育》,就是她的探索成果。

余德英希望能够将中国近代前的英语教育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讲清楚,为此,她“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将1620年英国第一艘商船抵达广东,中英两种语言开始直接接触,到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建,这一时期里英语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作了再现,还原了中国英语教育的早期历史。

从1620年到1862年的242年间,英语的学习和教学活动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构成了所谓“前近代中国英语教育史”。要还原这段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这242年历史进行分期,以期把握其阶段性变化,进而把握其发展脉络。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依据不止一种,余德英的依据则是英语教材编写的方式。英语与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早期的学习者学习英语通常是借助汉语给英语单词注音,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注音方式和相应的教材。根据不同注音方式的教材的变迁,她将前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历史分为无字书时期(1620—1748)、粤语字书时期(1748—1815)、粤英字书时期(1815—1839)、多语字书时期(1839—1862)四个阶段,不失为一种有依据且能将英语教育历史渐进地加以反映出来的分期方式。而在每一个阶段之内,从历史背景开始讨论,说明这一时期英语教育何以会如此的经济、政治、社会原因,即说明“为什么教”的问题;接着从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者和学者群体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即说明“教什么”“怎么教”“以什么方式教”“谁在教(学)”等问题,展现了不同时期英语教育的发展状况及英语教育由微而著的逐步生发过程。

值得肯定的是,余德英十分注意把握英语教育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努力从历史背景、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群体诸方面进行概括,使得英语教育历史发展的线索十分清晰地展现出来了。如说:英语教育发展的动因,从自发的、以贸易为主的实用性目的推动,到由多因素推动而成为学校教育组成部分的变化;政府对英语教育的政策,经历了从无视、禁止、容忍到认可的变化;英语教育的宗旨,经历了从个人谋生到社会专门人才的变化;教学内容,经历了从日常生活教育到社会实用文化知识教育的变化;教材,经历了从无字书、有字书到多语字书的变化;教学方法,经历了从自然习得的直观法

到多语记音的直接法的变化;教学组织形式,经历了从生活场景的自然习得、个别教学到集体教学的变化;语言特征,从澳门葡语、广州英语、洋泾浜英语到标准英语的变化,如此等等,多维度地展现了前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逐渐生成过程。上述论述给人颇多启发。

余德英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中国近代之前的英语教育能够讲清楚了,一部完整的前近代中国英语教育史得以初步构成。这一点,值得肯定,也值得庆幸!由于作者长期从事英语教学,历史研究并非其本来专业,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舍家别子,离开温暖舒适的广东,北上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苦读四载,得以在教育史研究方面登堂入室,个中甘苦只有自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作者所获成绩十分可喜,但其研究的领域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究的问题,即使其著作所论述的范围内也仍有诸多可探究处。希望作者未来能在这一领域里继续深耕下去,在对史料的发掘、对史实的理解和分析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期待着!

杜成宪

己亥年乙亥月于上海

前言

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英语被纳入官立学校教育课程,标志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正式开启。然而,早在1620年英国第一艘商船“独角兽号”抵达中国广东沿海,拉开了中英双方在中国本土大规模贸易交流的序幕,英语亦随着中西贸易活动的发展渐进式地传入中国,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

由于诸多原因,以往人们对1620—1862年的中国英语教育只有零星了解,缺乏完整认识。在中英双方接触之初,中国人是如何学习、理解和使用英语语言的?英语经历了怎样的中国本土化过程?英语教育如何由民间自发性的语言学习逐渐上升为官方制度化的学校英语教育?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对英语学习的意识和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如何从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到逐渐认同和接受这种“夷语”及文化,并且最终将其纳入学校教育的核心课程?通过对1620—1862年中国英语教育的研究,笔者试图系统地回答上述问题。正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言:“现在的根,深扎在过去,而对于寻求理解现在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子的人们来说,过去的每一事件都不是无关的。”^[1]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学校英语教育的诞生,是1620年以来中国民间英语教育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结果,两者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

以1620年英国商船“独角兽号”抵达中国广东为起点,以1862年

[1] 转引自:吕达,课程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4.

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为终点，本书探讨了英语教育在中国的起源及其由商行用语逐步发展成为学校课程的过程。以中国英语教材的变迁为主线，将中国英语教育划分为无字书、粤语字书、粤英字书和多语字书四个发展时期，探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英语教育的背景、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群体的演变，揭示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英语教育由一种自发性的生活语言学习活动逐渐发展为一门初具制度化性质的学校教育课程的历程，由此展现京师同文馆成立之前中国英语教育的历史画面。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无字书时期的英语教育 (1620—1748)	... 1
第一节 中国英语教育的源头 ——澳门葡语教育	... 3
第二节 中国英语教育的萌芽 ——广州英语教育	... 21
第二章 粤语字书时期的英语教育 (1748—1815)	... 45
第一节 中西贸易关系变化与粤语字书的 诞生	... 47
第二节 粤语字书及其教育内容	... 55
第三节 粤语记音法	... 79
第四节 英语教育机构与教育群体	... 88

第三章 粤英字书时期的英语教育	
(1815—1839)	... 99
第一节 贸易走私与宗教传播影响下的 英语教育	... 102
第二节 粤英字书时期的教材及教育内容	... 110
第三节 语法翻译法和背诵法	... 133
第四节 教育组织形式	... 144
第五节 从广东十三行到普通民众的英语 教育群体	... 163
第四章 多语字书时期的英语教育	
(1839—1862)	... 171
第一节 国内局势的变化与英语教育的 兴盛	... 174
第二节 教材及其内容分析	... 183
第三节 教学方法	... 198
第四节 规范化英语教育与不规范英语 教育	... 213
第五节 从普通民众到士大夫阶层	... 233
结语	... 242

第一章

无字书时期的英语教育 (1620—1748)

15 世纪末沟通中西的新航线开辟后,以葡萄牙、西班牙为首的西方殖民国家叩开东方的大门,尤其是葡萄牙人租赁澳门后,将其变成贸易及传教的中心,给澳门华人的生活带来很大变化。为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和自身生存的需要,澳门华人在与外国人的生活交往中不得不突破“华夷有别”的观念,自发地学习和掌握外语,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了解渗透在语言深处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英语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萌芽、发展和变化的。自 1620 年英国第一艘商船“独角兽号”抵达广东,汉语和英语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开始有了直接接触与交流,由此揭开中国英语教育的序幕。至 1748 年,中国英语教育经历了从澳门葡语教育到广州英语教育的变化,并且具有鲜明的无字书教育特征。

第一节

中国英语教育的源头 ——澳门葡语教育

1492 年新航线开辟后,葡萄牙率先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往来。1557 年葡萄牙以贿赂手段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澳门遂成为中西贸易及宗教传播中心。在长期的商品贸易和宗教活动过程中,澳门华人逐渐习得葡萄牙语和拉丁语,其中以葡萄牙语在生活中的运用最为广泛,并因其带有浓厚的澳门方言特征,被称为“澳门葡语”“澳门土话”或“广东

葡语”。这种澳门葡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充当中西贸易通用语,并在英语传入广州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可视为广州英语的前身。

一、澳门葡语教育环境的形成

早在新航线开辟之前,中国通过波斯、阿拉伯和拜占庭帝国中转,与欧洲建立了间接的商业贸易往来,中国文明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欧洲。15 世纪后期,西方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及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而此时中西贸易通道被逐渐强大起来的奥斯曼帝国阻断。为了追求货币和开拓海外市场,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率先探索通往东方的通道。

1492 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人继续向西推进,经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开辟了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1497 年,葡萄牙人在达·伽马(Vascoda Gama)的率领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卡纳诺尔(Cannanore)和科钦(Cochin)等地,并于 1501 年在此建立商馆。1510 年和 1511 年又分别占领了果阿(Goa)和马六甲(Malacca),开始与暹罗、马鲁古群岛和中国展开贸易往来。

1513 年,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在南洋华人通事的带领下,首次到中国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此后葡萄牙多次派遣使者前来中国,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1517 年,葡萄牙使团在南洋华人通事的带领下抵达中国,后由于通事卷入明代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斗争,葡萄牙使团受到牵连,最后被驱逐出境。这次外交失败使葡萄牙放弃了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的尝试,开始在中国沿海的浪白澳^[1]、

[1] 浪白澳,一个离澳门非常近的岛屿。详见:[瑞]龙思泰,早期澳门史[M],吴义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2.

泉州、福州、宁波等地开辟商馆,从事海盗走私贸易。这种行为最终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抗,因此明政府关闭了葡萄牙商馆。

嘉靖末年,沿海倭乱基本平息,面对民间海外贸易力量的壮大和朝廷内部财政危机,明政府开始放宽海外贸易政策。在沿海从事走私活动的葡萄牙人借机一改原先海盗式的贸易行为,采用乞求和奉承的态度,于1553年获得进入澳门的机会。“1557年葡萄牙人以惯用之贿赂方法,得中国政府之允许,在濠镜筑庐,以曝晒及存贮货物。”^[1]

葡萄牙在澳门站稳脚跟之后,西方耶稣会士接踵而来。耶稣会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于1534年在巴黎创立。时值欧洲宗教改革,英国、德国等纷纷脱离天主教会,皈依新教,耶稣会在欧洲本土失去大批信众。为了赢回欧洲的信仰失地,罗马教廷采取“失之欧洲,补之东方”的策略,^[2]向远东派出了大批传教士。在罗马教皇的指派下,天主教征得葡萄牙王的支持,派教徒搭乘葡萄牙商船前往东方。1552年,第一位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cis Xavier)到达广东台山上川岛。此后,以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先后抵达澳门。至16世纪80年代,大约有630名耶稣会士和200名其他各地修会的布道者被派往中国。^[3]西方传教士到达澳门,为中西语言交流与教育提供了契机。

尽管中国对澳门拥有政治主权,但是在葡萄牙殖民者到来之前,它是一个荒芜的小岛。葡萄牙人赁居澳门之后,逐渐将其变为西方殖民者的贸易和传教中心。明朝政府官员收取了葡萄牙人的贿赂及租金,对葡

[1] 黄启臣. 澳门历史(远古—1840)[M]. 澳门: 澳门历史学会, 1995: 45-46.

[2] 于桂芬. 西风东渐: 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3.

[3] Louis le Comte.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Made in a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M]. London: Printed for Benj. Tooke at the Middle Temple Gate, M. DC. XCVII, [1697]: uv15.

牙人在澳门的生活和教育采取“无视”的态度。“葡人携货来粤通商,每至必在澳下货贸易,逮冬及春,顺风利航,返棹而去。诸传教士,亦藉是往来中国。帆船赖季候风行驶,濠镜处东西洋交通之要点,宜其发展甚早,而为 16 世纪之一大商埠也。”^[1]可见,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后,此地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闽粤商人趋之若鹜”。据统计,1555 年,澳门人口总数仅为 400 人;1562 年,澳门总人口数达到 800 人,其中,中国人口 200~300 人,葡萄牙人口 500~600 人;1565 年,澳门总人口为 900 人;1569 年,有 5 000~6 000 名基督徒;到 1640 年,澳门总人口数量激增至 40 000 人,其中中国籍 29 000 人,葡萄牙籍 6 000 人,其他国籍 5 000 人。^[2]

在澳门开埠初期,葡萄牙人口明显比华人多,这是早期澳门华人率先习得葡萄牙语的决定性因素。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以男性为主,出于生理和生活的需要,他们不仅购买华人为奴,而且娶奴婢或当地贫苦家庭的女子为妻,这为华人在葡萄牙人家庭环境中学习葡语创造了条件。此外,欧洲耶稣会士极力发展华人教徒,对华人实行“葡化教育”政策。可见,在早期澳门的中西交往中,华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位上都不如西方人,这就决定了在澳门的西方人作为强势群体而存在,而当地华人只能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由此奠定了葡语作为强势语言的基础,以葡萄牙人为主的西方人在澳门生活中占据话语的主导权。为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和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华人不得不接受葡语教育,力求掌握葡语以谋生处世。与此同时,由于中西语系本身的差异以及教育环境的限制,华人在学习葡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母语影响,因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澳门葡语。澳门葡语教育就是在这种华

[1] 邓开颂,黄启臣. 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87.

[2] 黄启臣. 澳门通史[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9. 汤开建. 明代澳门史论稿(下)[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455.